

西汉陵庙与陵寝建制考*

——兼论海昏侯墓墓园中的祠堂与寝

张闻捷

内容提要 西汉时期陵庙与陵寝有着不同的建筑形制：陵庙为祭祀神主之所，形成了平面方形、四向五室的建筑格局；陵寝则为放置死者衣冠、几杖之地，建筑形制同于生人居室，努力营造“事死如生”的氛围。受此影响，西汉一朝的重臣贵胄也纷纷在墓园内起立祠堂，并同样将其建成方形、四面开门的形制。而普通仕宦和平民的墓祭祠坛也都按例用瓦甃砌成方形，所以《葬律简》中明确记载“(彻侯)祠舍盖，盖地方六丈”，由此为我们推测海昏侯墓墓园中的祠堂与寝殿建筑的形制与功能提供了新的启示。

关键词 汉代 陵庙 陵寝 祠堂 建筑形制

DOI:10.16319/j.cnki.0452-7402.2019.04.002

西汉朝是中国古代宗庙制度的重要变革时期。自秦始皇在陵园北部首创陵寝之制^{〔1〕}，并将渭南极庙与骊山相通^{〔2〕}后，周代都城之内方置庙、寝的传统做法逐渐被取代^{〔3〕}，在陵墓之旁另设庙、寝进而形成独立的墓祭系统便成为西汉王室的常制^{〔4〕}。王充《论衡·四讳》“古礼庙祭，今俗墓祭”，蔡邕《独断》“古不墓祭，至秦始皇出寝，起之于墓侧，汉因而不改”等，皆指出了这一显著的变化。

* 本研究得到“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FJ2018B103)”的资助。

〔1〕 张仲立：《秦始皇陵礼制建筑群与“秦始皇出寝”》，《考古与文物》2011年第2期。不过在秦咸阳毕陌陵区和临潼东陵区内封土旁侧都发现有地面建筑遗址，如果也属于祭祀类遗存，就表明陵寝之制或许早在秦惠文王、武王时代就已经出现了。参看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咸阳“周王陵”考古调查、勘探简报》，《考古与文物》2011年第1期；杨宽先生还认为战国楚王陵（夷陵）也有陵旁并立庙、寝的情况，但目前考古发现尚未找到。参看氏著：《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页28，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2〕 《史记·秦始皇本纪》：“（二十七年）作信宫渭南，已，更命信宫为极庙，象天极，极庙道通骊山。”始皇此举实则将都城庙祭与陵寝的祭祀逐渐协调统一起来。《史记》卷六，页127，清乾隆武英殿刻本。

〔3〕 《左传·庄公二十八年》：“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左传·杜林合注》卷七，页84，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周代庙、寝之制自古以来多有学者论及，可参看前揭《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的系统梳理，页16—18。

〔4〕 据刘庆柱、李毓芳先生的进一步研究，“（西汉时期）太上皇、高祖和惠帝的庙已立于汉长安城内，文帝庙立于城郊，后来因园陵的寝、便殿建筑设于陵园之内，为了方便陵事活动，又筑‘原庙’于以上诸陵之旁。真正‘居陵旁立庙’当始于景帝阳陵，终西汉一代这个制度沿袭下来，如武帝龙渊庙、昭帝徘徊庙、宣帝乐游庙和元帝庙等都在‘陵旁’”。刘庆柱、李毓芳：《关于西汉帝陵形制诸问题探讨》，《考古与文物》1985年第5期；这一制度变化也影响至外戚家族，如《史记·外戚世家》：“（薄太后）追尊薄父为灵文侯，会稽郡园邑三百家，长丞已下吏奉守冢，寝庙上食祠如法”；灵文侯夫人园邑置柘阳，“如灵文侯园仪”；“薄太后乃诏有司尊窆后父为安成侯，母曰安成夫人。令清河置园邑二百家，长丞奉守，比灵文园法。”前揭《史记》卷四九，页643—644。

受此影响，西汉中后期的重臣贵胄也纷纷在墓园之内起立祠堂，盛为装饰，如刘贺、霍光、霍禹、张安世、张禹等^{〔1〕}，而普通仕宦及平民则多简化为在墓葬之旁设立祠坛。由此可见，陵庙（祠堂、祠坛）与陵寝（园寝）在西汉时代的国家、个人祭祀礼仪中均占据着重要地位，是了解这一时期墓祭制度发展演变的窗口。但由于建筑遗址较难保存，兼之文献阙载，长期以来对于它们的具体形制特征都是认识不清的，幸而近来陆续发掘了江西南昌海昏侯墓、陕西西安凤栖原张安世家族墓、青岛土山屯墓群等较为完整的西汉墓园^{〔2〕}，发现了保存较好的西汉祠堂、祠坛遗迹，并在湖北云梦县出土了记载西汉列侯等级墓园营建制度的“葬律简”^{〔3〕}，再结合此前西汉帝陵的勘探资料，我们发现西汉时期陵庙与陵寝在建筑设计上存在显著的规律性，从而为了解其具体形制提供了新的认识。

一 祠堂与祠坛

海昏侯墓墓园内共发现建筑遗存14处，其中主墓M1、M2刘贺夫妇墓前有4座：东西两侧均为纵向三开间的对门院落（F13、F14）。东侧院落F14前发现三个圆形灰坑，直径约1米左右，其中南、北两个坑内发现红烧土块、木炭、灰烬等，显然是火塘一类的遗迹，西侧院落F13前则有一口水井（J1），故发掘报告及研究者均主张这组对门院落是进行祭祀供膳的食官遗址，同时也可供墓园管理者及侍奉人员居住（园寺吏舍类遗址）^{〔4〕}。而中部另有方形建筑F1和曲尺形（或称“倒凹形”）建筑F2各一处。F1边长约10米，四面正中开门，并在转角处设四座L型配房，北部门道正中有一圆形祭祀坑。F2长约14米、宽约10米，北、东、西三面为长房，南面立两柱、开三门，外侧环绕以回廊一周。同时，这种曲尺形建筑又见于M4、M5、M6墓前（F5、F6），只是部分形制简化，不建回廊〔图一〕。

发掘者指出方形建筑F1应为园寝，而曲尺形建筑F2、F5、F6等均为祠堂（园庙）^{〔5〕}。但近来刘瑞先生

〔1〕 《汉书·霍光传》：“光薨……发三河卒穿复土，起冢祠堂”，《汉书》卷八，页111，清乾隆武英殿刻本；《汉书·张安世传》：“赐莹杜东，将作穿复土，起冢祠堂”，前揭《汉书》卷五九，页916；《汉书·张禹传》载：“禹年老，自治冢，起祠室，好平陵肥牛亭部处地，又近延陵，奏请求之，上以赐禹，诏令平陵徙亭它所。”前揭《汉书》卷八一，页12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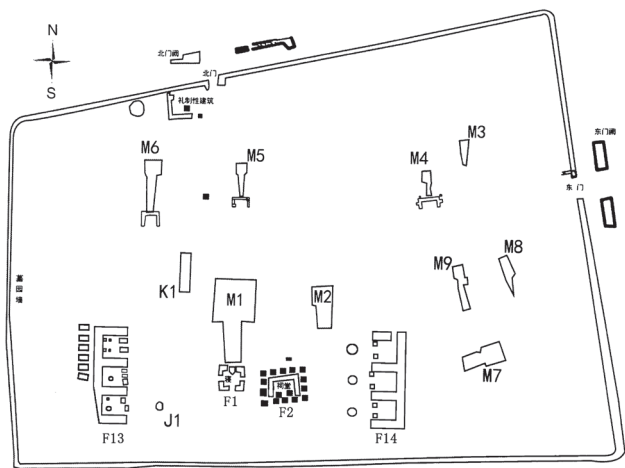
〔2〕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南昌市西汉海昏侯墓》，《考古》2016年第7期；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首都博物馆：《五色炫曜——南昌汉代海昏侯国考古成果》，江西人民出版社，2016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安凤栖原西汉墓地田野考古发掘收获》，《考古与文物》2009年第5期；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山东青岛市土山屯墓地的两座汉墓》，《考古》2017年第10期；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青岛土山屯墓群考古发掘重要新发现》，《中国文物报》2017年12月22日。

〔3〕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云梦县博物馆：《湖北云梦睡虎地M77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08年第4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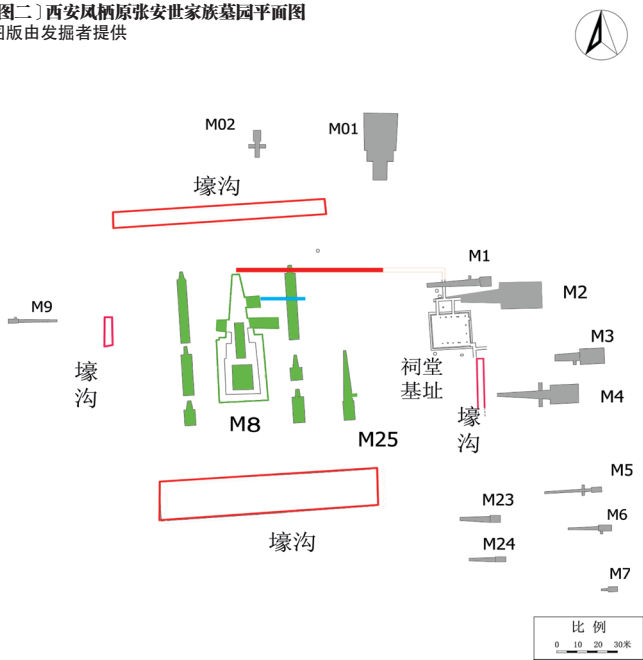
〔4〕 高崇文：《西汉海昏侯陵墓建制琐谈》，《南方文物》2017年第1期。秦始皇陵园内食官遗址和园寺吏舍遗址南北分立，不过海昏侯墓葬制不比帝陵，建筑规制上或有缩减。

〔5〕 祠堂为墓园之中的祠祀之地，显然与园庙性质一致。《汉书·韦玄成传》载：“寝，日四上食；庙，岁二十五祠”，前揭《汉书》卷七三，页1114，也显示出庙与祠的紧密联系。当然，汉代祠祀盛行，并不局限于祖先墓祭，参见田天：《秦汉国家祭祀史稿》页346—353，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

〔图一〕南昌海昏侯墓墓园平面图



〔图二〕西安凤栖原张安世家墓园平面图
图版由发掘者提供



结合张安世墓园和“葬律简”的记载又提出，方形建筑F1更似祠堂，而曲尺形建筑F2、F5、F6等均为园寝^{〔1〕}。因为在整个张安世家墓园内，虽然共发现了14座墓葬及6座附葬坑，但建筑遗存却仅有一处，立于墓地正中位置，为面三进五的方形台室，门道东向，边长19米〔图二〕^{〔2〕}。虽然其具体形制与海昏侯墓F1略有差别，但很显然均是方形的建筑。而依据《汉书·张安世传》“起家祠堂”的记载来看，将其理解为祠堂无疑更为合理。同时在记载西汉列侯等级墓园营建制度的“葬律简”中也提到，“（彻侯）重园垣之，高丈。祠舍盖，盖地方六丈”^{〔3〕}，即列侯等级的祠堂应是一座边长6丈（合13.8米）的方形建筑，与上述考古所见是较为吻合的。

实际上，在西汉中期的满城二号汉墓中，也曾发现性质相近的墓祭遗存。墓内中室出土有四方封泥（19号），每件长2.7厘米、宽2.6厘米、厚1厘米，上有铭文四字：中山祠祀^{〔4〕}。“祠祀”在皇家属太常分支，掌管宗庙祭祀活动，所以这揭示出该墓中室是一个供奉祭品的空间，与“祠堂”在祭奠逝者的功能上是十分相近的。其中西南角建有一个特别的方形平台，长3.8米、宽3.4米、高0.4米，由夯土筑成，外缘包砖，上面承供着一件漆案（内有漆盘和耳杯）、一件漆樽、一件铜盆、一盏铜灯和两盏小熏炉；而在对面的东南角，则有另一组器物，底部铺设竹席，四角仍有作为席镇的铜豹，席上摆放着三件铜鼎（52、53、54号）、两件铜壶（42、45号）、两件铜钺（29号）以及其他二甗、二釜、二盆、一炉、一匱、一耳杯和小型人物、动物雕像等，并且铜容器器形皆十分矮小

〔1〕 刘瑞：《海昏侯刘贺墓墓园制度初探》，《南方文物》2016年第1期。
 〔2〕 前揭《西安凤栖原西汉墓地田野考古发掘收获》。
 〔3〕 这条简文记载又可以得到《盐铁论·散不足篇》“中者祠堂屏闾，垣阙累囿”的印证，正指出当时祠堂林立的局面，而垣阙累囿设施在简文中都有详尽的规定，说明直到宣帝朝，葬律中的部分内容仍得到沿用。参见《盐铁论》卷六，页37，四部丛刊景明嘉靖本。
 〔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满城汉墓发掘报告》第一卷，页228，文物出版社，1980年。

(如鼎的通高仅约8厘米)，无疑属明器之类^{〔1〕}。虽然其性质目前还没有确切的答案，但可以发现，这种为祭奠死者特别营建的祠祀遗存也采用了方形的建筑规制。

近来，这种相似的遗存又见于青岛土山屯墓群中。简报中称之为“祭台”，目前共发现七处，均位于墓葬封土南侧的缓坡之上，略呈方形，边长2米—2.5米。其基本结构是东西向铺素面平砖，再在周围用立砖砌出平台范围〔图三〕，其中编号封10的砖构平台中央放置有一件灰陶罐，应是对墓葬进行祭奠的遗存^{〔2〕}。与满城二号汉墓的祠祀祭台相比，虽然其由墓内移到了墓外，但性质显然均是墓祭之属，且也制作成方形形制。

〔图三〕青岛土山屯墓群祭台遗迹
图片由发掘者提供



由此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联想到《史记·孔子世家》集解引《皇览》所载：“孔子冢……冢前以瓴甃为祠坛，方六尺，与地平，本无祠堂”，孔子时代墓祭并不盛行，尚未见到有祠堂、祠坛一类的遗存，所以这应该是汉人依据汉世的情况比附的，瓴甃一词出自司马相如《长门赋》，正是指砖块之意，所以满城汉墓和土山屯墓群的这批砖砌祭台不妨暂且可以定名为“祠坛”，亦是汉代墓祭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3〕}。而且祠坛以“六尺”为度，而列侯“祠堂”又定“六丈”之限，恰为十倍，说明汉世在设计这些祭祀制度时是有着严格考量的。

综上所述可知，西汉时期的祠堂、祠坛遗存皆采用了方形的建筑形制，表明在当时祭奠死者的陵庙（详下文）、祠堂、祠坛类建筑存在统一的设计原则，遵循着相对一致的礼制思想。而且，我们知道，陵寝仿造生人居寝而来，内部主要放置死者衣冠、几杖等，每日“四上食”，并有“宫人随鼓漏，理被枕，具盥水，

〔1〕 施杰先生认为其分别对应了《仪礼》中的“阴厌”和“阳厌”之礼，兹可备一说。施杰：《交通幽明——西汉诸侯王墓中的祭祀空间》，载巫鸿等主编：《古代墓葬美术研究》（第二辑）页74—83，湖南美术出版社，2013年。

〔2〕 前揭《青岛土山屯墓群考古发掘获重要新发现》。

〔3〕 设祠坛行墓祭之礼又见于“郎中郑固碑”和“从事武梁碑”，参看前揭《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页120。另值得注意的是，汉人董仲舒《春秋繁露》中记载，四时求雨仪节时，都是“为四通之坛”，方形，尺寸按四时不同，亦可说明汉人在设置祭坛时普遍崇尚方形。见《二十二子》，《求雨》第七四、《止雨》第七五，页803—804，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陈严具”（《续汉书·祭祀志下》^{〔1〕}），象征如生时一样供奉逝去的亲人，所以这种“日常起居生活”应该是因人而异的，不大可能把不同世系、不同性别的亲人集合到一个院子里来共同“生活”并奉养，如西汉宣帝杜陵陵园内，宣帝和王皇后陵便分别建有陵寝（详下文）^{〔2〕}。海昏侯墓墓园中用于生人起居的F13、F14也均建成了与F2一样的曲尺形、三开间房屋，说明这正是当时居所的一般形制，而且这种形制的房屋在M4、M5、M6等墓前均有设置，故而将其理解为“园寝”岂非更为适宜^{〔3〕}？而陵庙则是藏神主之地，本来就需要依据身份世系来排列昭穆之位，蔡邕《独断》“庙以藏主，列昭穆”，所以一座墓园之内通常只需建设一座陵庙（祠堂），这样既便于管理，而且将神主依据昭穆制度合祭也是先秦以来信而有据的礼法^{〔4〕}。现在看来，不仅海昏侯墓墓园、张安世家族墓园如此，西汉诸皇陵内也是如此，而且大多只见帝陵的陵庙，皇后在一般情况下不得享有^{〔5〕}。

二 方形陵庙

那么，为什么西汉时期的祠堂、祠坛都须建成方形呢？实际上，这是从帝陵陵园规划中确定下来的制度。

在汉景帝阳陵陵园内曾发现了著名的“罗经石”遗址，位于陵园南部偏东处。平面呈正方形，边长260米，四周有壕沟围绕，四面正中各开一门，四门间是四个L形、附带散水的建筑。内部中心是正方形夯土台基建筑，四面各有三个门道，共十二门道，建筑四周的铺地砖、墙壁等，均按照东、西、南、北方位的不同，分别涂有代表不同方位的青、红、白、黑诸色。中心台正中有一块方形“罗经石”，边长1.7米、厚0.4米，上面加工成直径1.35米的圆盘，圆盘正中刻有十字凹槽〔图四〕^{〔6〕}。

与“罗经石”遗址形制几乎相同的建筑又见于2003年公布的“王莽九庙”遗址，其平面亦呈正方形，边长近55米，四周围墙环绕，四面正中各开一门，四门之间转角处是四个L型的配房，内部正中是带有堂、室的夯土台基建筑，也是四面各开三门、共十二门之制。四面门址按不同的方位分别出土四神空心

〔1〕 至迟在宋代，司马彪所著的《续汉书》志便已合入范曄所著的《后汉书》。因此本文引用的《续汉书》皆采自《后汉书》百衲本景宋绍熙刻本，后不赘述。

〔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杜陵陵园遗址》，科学出版社，1993年。

〔3〕 发掘简报将F2类建筑推测为祠堂很大程度上应是受到东汉时期石质祠堂的影响，如孝堂山石祠、武梁祠等，实际上东汉时期的陵庙、陵寝制度与西汉迥异，详见下文的讨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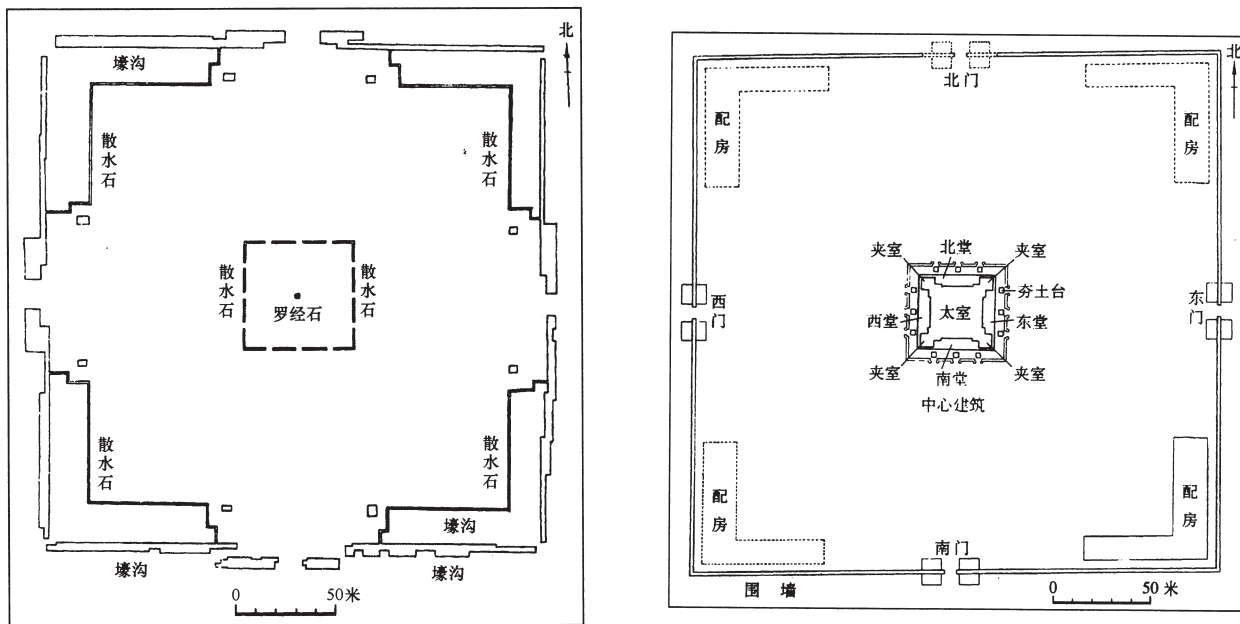
〔4〕 如《汉书·韦玄成传》：“禘祭者，毁庙与未毁庙之主皆合食于太祖，父为昭，子为穆，孙复为昭，古之正礼也。”前揭《汉书》卷七三，页1115。

〔5〕 唯有高祖之母与昭帝之母因单独置陵园，故得享陵庙，《汉书·高帝纪下》如淳注曰：“《汉仪注》：高帝母兵起时死小黄北，后于小黄作陵庙”，前揭《汉书》卷一下，页35；《汉书·昭帝纪》：“夏，为太后起园庙云陵”，前揭《汉书》卷七，页100。孝文太后虽有南陵，但未见设庙的记载。

〔6〕 马永赢、王保平：《走进汉阳陵》，文物出版社，2001年。

〔图四〕汉景帝阳陵罗经石遗址(左)与王莽九庙(右)平面图

图版采自高崇文:《秦汉帝陵陵寝制度探讨》,《国学研究》第三十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



砖或瓦当, 残留的墙壁上也分别涂有代表不同方位的颜色。尤其在12号庙址中心台的正中, 也放置着一块柱础石, 扁平椭圆形, 长2.44米、宽2.05米、厚0.82米, 顶面中部刻出平座, 平座长1.85米, 宽与石同^{〔1〕}。

据此, 高崇文先生认为, “罗经石”遗址当与“王莽九庙”的性质、功能相近, 同属于宗庙类建筑, 所以它应该就是王学理、杨宽、李零等先生所提出的汉景帝阳陵的陵庙——德阳宫^{〔2〕}, 而“罗经石”应该如傅熹年、钟晓青等先生所言, 为德阳宫的中心柱础石^{〔3〕}。

此外, 在宣帝杜陵陵园内, 其实也曾发现了类似的遗存, 编号为八号遗址, 位于陵园的北部居中位置, 平面也呈近方形, 夯土台基建筑, 东西长约73米、南北宽约70米, 四面开门, 并出土了大量的龙、凤纹空心砖残块, 与王莽九庙的四神空心砖是十分相近的。而这种图案的空心砖, 在杜陵诸遗址中仅见于此。发掘者将其隶定为陵庙遗址, 是十分正确的, 只可惜此遗址由于平整土地而被破坏殆尽, 建筑形制已经不可详考了^{〔4〕}。

由以上诸多实例看来, 汉代景帝之后的帝陵陵庙以及“王莽九庙”应该都是按照方形形制来设计规

〔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汉礼制建筑遗址》, 文物出版社, 2003年。

〔2〕 王学理:《太社乎? 陵庙乎?》,《文博》2001年第5期;前揭《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页20;李零:《说汉阳陵“罗经石”遗址的建筑设计》,《考古与文物》2002年第6期;高崇文:《秦汉帝陵陵寝制度探讨》,《国学研究》第三十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

〔3〕 前揭《说汉阳陵“罗经石”遗址的建筑设计》文后补记。

〔4〕 前揭《汉杜陵陵园遗址》页75。

划的，与先秦以来的前堂后室式宗庙形制已然相去甚远。而这种设计理念显然是受到了“五行”观念的影响：自高祖刘邦建国之初就确立了祭祀五方帝神的体系，汉文帝时又将该祭祀移至长安北部的“霸渭之会”，并修建“渭阳五帝庙”^{〔1〕}，其建筑形制为“同宇，帝一殿，面各五门，各如其帝色”（《史记·封禅书》），所以也是“四向五室”的大型建筑，与罗经石、王莽九庙等相同^{〔2〕}。这样看来，这种统一的形制规划可能自文帝朝便被确定下来^{〔3〕}，成为皇家宗庙、陵庙的建筑定制。而“上行下效”又有律法约束（“寝庙上食祠如法”），西汉中后期各地涌现的墓园祠堂、祠坛等墓祭遗存也都纷纷建成方形，唯有在具体细部形制上略有差异罢了^{〔4〕}。

此外我们还注意到，西汉诸陵的帝陵陵园也多建成方形，并四面各开一门。如景帝阳陵平面正方形，底部每边长160米，并围有方形墙垣；武帝茂陵平面近正方形，底部东西长243米、南北238米；杜陵陵园平面为方形，边长433米等^{〔5〕}，似乎也表明西汉时期在奉祀祖先的礼仪上多崇尚方形的建筑原则，而且这在战国时期也自有其渊源：著名的战国中山王陵铜版兆域图上，中山王、后、夫人的享堂建筑都设计成方形，其中王堂、王后堂、哀后堂“方两百尺”，夫人堂“方百五十尺”，堂下所建四座宫殿诏宗宫、正奎宫、执帛宫、大将宫均是“方百尺”^{〔6〕}；而早年发掘的辉县固围村战国魏王陵东西三墓并列，三墓之上也各有方形的建筑遗址^{〔7〕}。所以，以方形建筑来祭祀陵墓可能在战国时期就已经成为较普遍的观念。汉人“因势利导”，又参以五行观念，而形成了西汉时期的陵庙建制。

三 陵寝与石祠

如上所述，秦汉时期的帝陵陵寝主要放置死者衣冠、几杖等凭依之物，并每日上食、盥洗，象征如生时一样奉养逝去的亲人。《汉书·平帝纪》里甚至记载：“乙未，义陵寝神衣在柩中，丙申旦，衣在外床

〔1〕 《史记·封禅书》：“夏四月，文帝亲拜霸渭之会，以郊见渭阳五帝。”但第二年，新垣平即被诛杀，“自是之后，文帝怠于改正朔服色神明之事，而渭阳、长门五帝使祠官领，以时致礼，不往焉。”前揭《史记》卷三八，页375。

〔2〕 前揭《秦汉帝陵陵寝制度探讨》。

〔3〕 周礼之中有圆坛祭天、方坛祭地的传统，如《周礼·春官·大司乐》：“夏日至，于泽中之方丘奏之，若乐八变，则地示皆出，可得而礼矣。”参见《周礼注疏》页789—790，载（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所以祠祀之事崇尚方、圆的原则可能自战国以来便已形成。

〔4〕 从细部结构来看，海昏侯墓墓园内的祠堂四面各开一门、转角均带有L形配房的建筑形制显然更接近皇陵陵庙的建制，而张安世家族墓园内的祠堂虽然也是方形，但却是面阔五间、进深三间的建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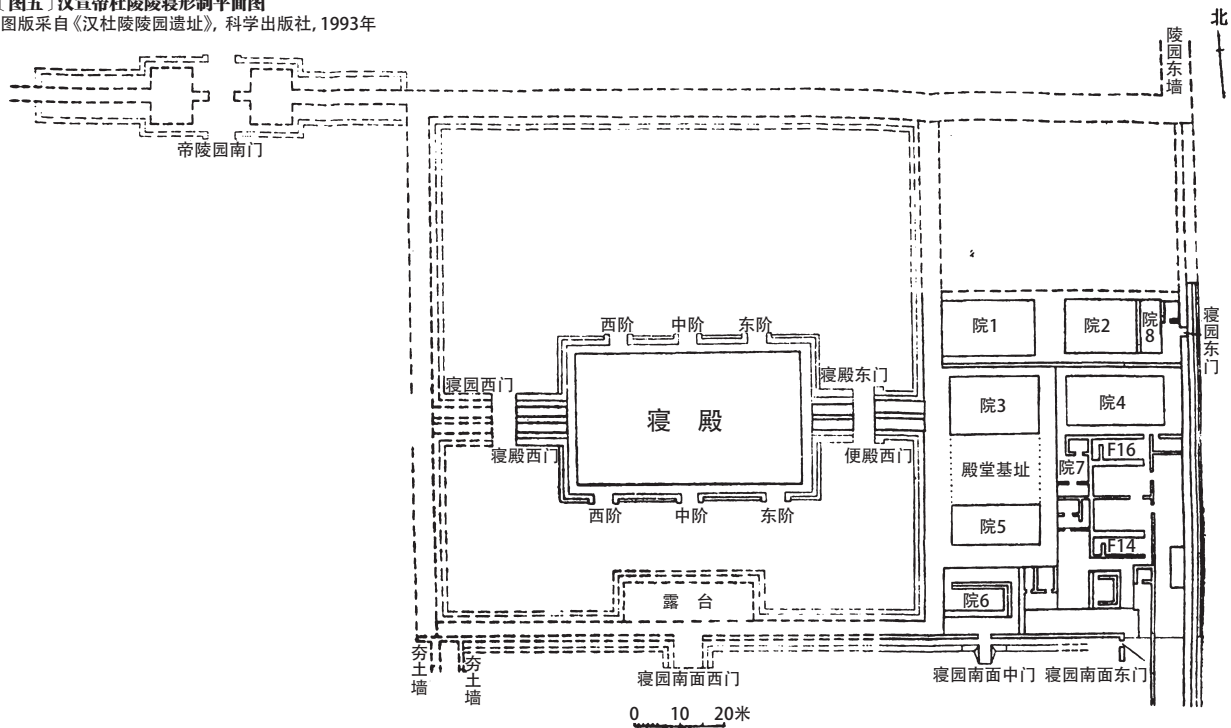
〔5〕 王丕忠、张子波、孙德润：《汉景帝阳陵调查简报》，《考古与文物》1980年创刊号；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汉武帝茂陵考古调查、勘探简报》，《文物》2011年第2期；前揭《汉杜陵陵园遗址》页8。

〔6〕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髹墓——战国中山国国王之墓》，文物出版社，1995年。按：关于《兆域图》中宫殿的名称，中山王墓报告中释读为“执帛宫”，一些学者如朱德熙、裘锡圭等释读为“执旦宫”，此处暂从报告。

〔7〕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辉县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56年。

〔图五〕汉宣帝杜陵寝形制平面图

图版采自《汉杜陵陵园遗址》，科学出版社，1993年



上，寝令以急变闻，用太牢祠”，说明陵寝中还配有衣衾、床榻一类的生活设施，所以其建筑形制应该与生人居所最为接近。

目前发现的秦始皇陵陵寝位于其陵园内西北部，是一组南北向的长方形建筑群，其中最南部的夯土台基相对独立，被认为是寝殿遗址，南北长62米，东西宽57米，周围环绕回廊^{〔1〕}，而北部则沿中轴线东西对称分布着九组建筑群，曾出土了“纳中东下卅六”、“内西七”、“泰左东丙三上”、“泰右东十八”四块刻文青石板。张卫星先生据此认为，“泰”为“太官”省称，“纳”或“西”为“内官”省称，所以这里应模仿的是内宫的“后寝”^{〔2〕}。也即是说，秦始皇将其后宫宫寝皆另置于此，来安置诸无后的嫔妃。这些建筑的形制，也都无一例外是三面围墙、南部开门的长方形院落式宫殿建筑。另在宣帝杜陵陵园内，也发现了两组陵寝建筑，分别位于宣帝陵和王皇后陵的南侧，形制基本一致，均是带有中央大殿的长方形多重院落式建筑〔图五〕^{〔3〕}。与前述各类陵庙遗址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特点。

由于资料所限，现在还不能够知晓海昏侯墓墓园内这种曲尺形的园寝在西汉中后期是否普遍，但我们注意到，在随后的东汉时期，地方墓葬中出现了一些立于墓前的石质祠堂遗迹，如著名的武梁祠、“朱

〔1〕 袁仲一：《秦始皇陵考古发现与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张占民：《秦始皇陵北寝殿建筑群的发现与初步研究》，《考古文物研究》，三秦出版社，1996年；前揭《秦始皇陵礼制建筑群与“秦始皇寝”》。

〔2〕 陵寝建筑的东侧就是后宫“非有子者”诸妃嫔的墓地，参见张卫星：《秦始皇帝陵园内城陵寝建筑探析》，《秦陵秦俑研究动态》2011年第2期。

〔3〕 前揭《汉杜陵陵园遗址》，图一〇、图二九。

〔图六〕孝堂山石祠
图版由杨爱国先生提供



鲔石室”和孝堂山石祠等。尤其是东汉早期的孝堂山石祠保存完好，为一座单檐悬山顶两开间房屋，面阔4.14米，进深2.5米，高2.64米〔图六〕^{〔1〕}；而被尝试复原的山东金乡县“朱鲔石室”祠堂也是一座双开间悬山顶式建筑，三面围墙而前部开门，室外面阔4.36米，进深约3.3米，高约3.4米〔图七〕^{〔2〕}。如从地基形制来看，均是实其后而虚其前的曲尺形，与海昏侯墓墓园内的诸园寝相近。近来在湖南省蓝山县五里坪墓地M364中出土了一件陶屋，同样为平面呈长方形的单檐悬山顶房屋，正面设有一门两窗，应是仿造普通百姓居所的模型明器，且该墓有纪年铭文砖称“永元七年八月造工”，所以应反映了东汉和帝时期的普通住屋形制，与上举石质祠堂形制基本相同^{〔3〕}。

但由此产生的疑问是，既然祠堂属于陵（园）庙系统，何以在东汉时期又与源于居寝的寝殿（园寝）形制一样了昵？其实，这是因为东汉之后，帝陵的陵庙、陵寝制度又出现重要的变革。自刘秀开始，东汉皇室将陵庙之制废止，而实行集中庙制，将宗庙建在都城之内，按“左祖右社”的原则布局，并将神主也集中到一庙之内^{〔4〕}，史称“共堂之制”^{〔5〕}。这样帝陵之旁便只剩陵寝建筑了，但墓祭的礼仪又继续沿用，明帝怀“圣孝之心”而创立“上陵礼”，率公卿群臣上陵拜谒其父原陵，并亲服三年，以为表率^{〔6〕}。自此，上陵

制一样了昵？其实，这是因为东汉之后，帝陵的陵庙、陵寝制度又出现重要的变革。自刘秀开始，东汉皇室将陵庙之制废止，而实行集中庙制，将宗庙建在都城之内，按“左祖右社”的原则布局，并将神主也集中到一庙之内^{〔4〕}，史称“共堂之制”^{〔5〕}。这样帝陵之旁便只剩陵寝建筑了，但墓祭的礼仪又继续沿用，明帝怀“圣孝之心”而创立“上陵礼”，率公卿群臣上陵拜谒其父原陵，并亲服三年，以为表率^{〔6〕}。自此，上陵

〔1〕 蒋英炬、杨爱国、信立祥、吴文祺著，山东省石刻艺术博物馆、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孝堂山石祠》，文物出版社，2017年；武梁祠祠堂的复原方案可参看费慰梅女士30年代的调查结果，与孝堂山石祠基本接近，《武梁祠建筑原型考》一文由王世襄先生翻译发表于1945年的《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七卷第二期），亦可参看郑岩：《看见美好——文物与人物》页182图3，人民美术出版社，2017年。

〔2〕 蒋英炬、杨爱国、蒋群著，山东省石刻艺术博物馆编：《朱鲔石室》页52，文物出版社，2015年。

〔3〕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2017湖湘文化考古之旅》页155，内部印发刊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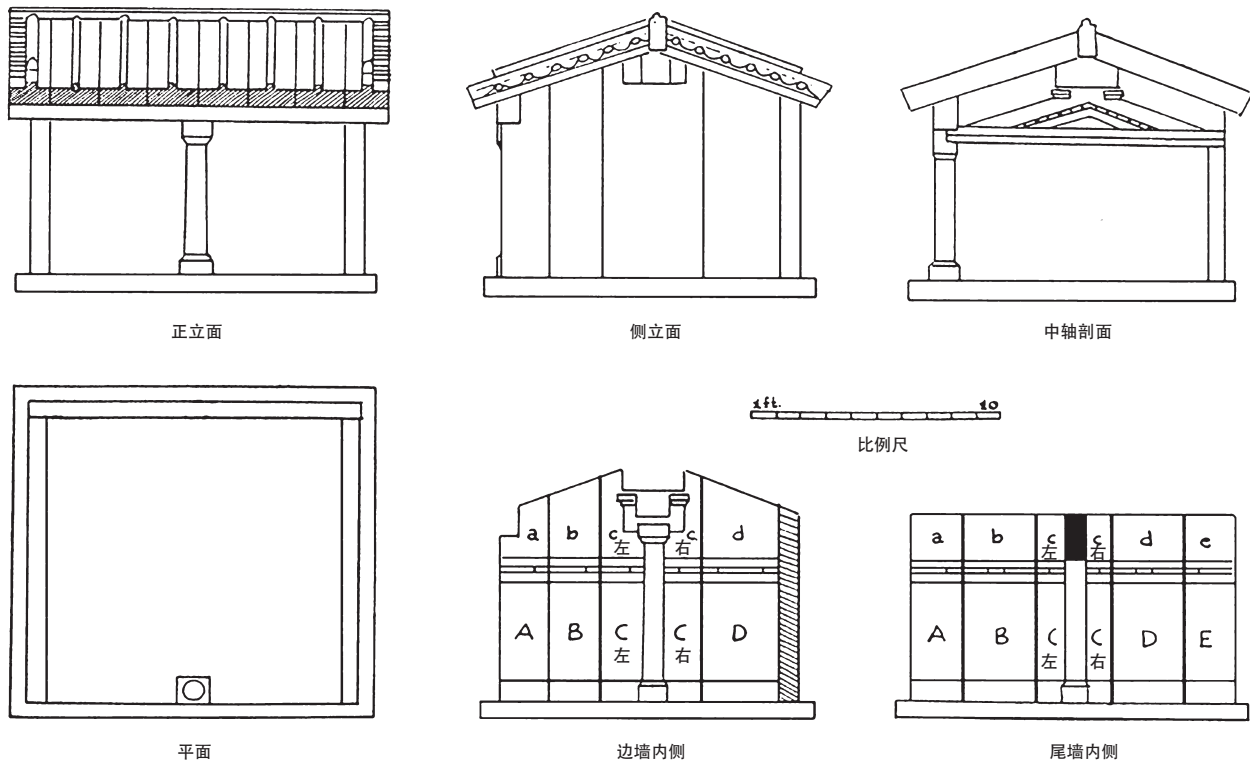
〔4〕 姜波：《汉唐都城礼制建筑研究》页91，文物出版社，2003年。当然刘秀在位时期为其父章陵仍修建了园庙，《后汉书·光武帝纪》：“（十七年）冬十月辛巳……甲申，幸章陵。修园庙，祠旧宅，观田庐，置酒作乐，赏赐。”《后汉书》卷一下，页27，百衲本景宋绍熙刻本。

〔5〕 《隋书》卷一五《音乐下》：“昔汉氏诸庙别所，乐亦不同，至于光武之后，始立共堂之制。”《隋书》卷一五《志第十》页190，清乾隆武英殿刻本。

〔6〕 《后汉书·显宗孝明皇帝纪》：“永平元年春正月，帝率公卿已下朝于原陵，如元会议。”前揭《后汉书》卷二，页37。

〔图七〕“朱铺石室”祠堂

图版采自《朱铺石室》，文物出版社，2015年



礼便成为东汉一朝的定制^{〔1〕}，但陵庙既废，这种上陵拜谒的礼仪自然只能在陵寝中进行，由此就出现了“因寝殿为庙”的现象。如《续汉书·礼仪志上》记载：“西都旧有上陵。东都之仪……昼漏上水，大鸿胪设九宾，随立寝殿前。钟鸣，谒者治礼引客，群臣就位如仪。乘舆自东厢下，太常导出，西向拜，折旋升阼阶，拜神坐。退坐东厢，西向”，可见原来应该在陵庙中进行的祭拜先祖的仪节已被改到了陵寝中，而且整个丧礼中，“每变服，从哭诣陵会如仪”（《续汉书·礼仪志》），即各种变换丧服的祭祀礼仪也都要到陵寝中来举行。由于此时神主已被放置于都城宗庙之中，所以陵寝内便不能再设神主，而仅有虚置的神坐。东汉一朝仅有年小而崩的殇帝、冲帝、质帝，和追尊为后的和帝母梁贵人、安帝祖母宋贵人、顺帝母李氏等因为无法配享宗庙，才将神主直接放在陵寝内，“就陵寝祭之”^{〔2〕}。

为了解决这一看似矛盾的问题（寝庙不分），东汉皇室从明帝显节陵开始又在陵园内增加了“石殿”建筑，东汉伏无忌所著《古今注》中对于东汉帝陵的陵寝建制有较为清晰的描述，如章帝敬陵，石殿、钟虞

〔1〕 《续汉书·礼仪志第四》：“正月上丁。祀南郊。次北郊、明堂、高庙、世祖庙谓之五供。礼毕。以次上陵。”前揭《后汉书》卷九四，页1267。

〔2〕 《续汉书·祭祀志第九》：“灵帝时，京都四时所祭高庙五主，世祖庙七主，少帝三陵，追尊后三陵，凡牲用十八太牢。”前揭《后汉书》卷九九，页1312。

〔图八〕洛阳朱仓M722东汉帝陵园建筑遗址(左西右东)



在行马内，寝殿、园省在东，园寺吏舍在殿北。其他显节陵、慎陵、恭陵、宪陵等基本也是如此配置^{〔1〕}，显然是将石殿作为祭祀正殿来使用，而寝殿则移至旁侧专置衣冠。所以石殿实则充当的是此前陵庙的作用，但因为都城之内已有高庙与世祖庙，并合祭诸帝、后神主于此，所以石殿在礼制层面又只能归入陵寝的系统内，不能按庙制来对待。魏武帝曹操去世后，按东汉礼制营建高陵，“立陵上祭殿”，但黄初三年魏文帝曹丕以“古不墓祭，皆设于庙”为由，“毁去高陵上殿屋”，使“车马还厩，衣服藏府”（《晋书·礼志》），可见这种源于东汉石殿的“祭殿”其实就是存放车马、衣服的场所，属于寝殿性质。虽然目前还不清楚其具体形制^{〔2〕}，但既然名为“石殿”，应该是以石材制成^{〔3〕}，并很可能参照殿堂之制营建〔图八〕。

〔1〕 《续汉书·礼仪志》刘昭注引《古今注》文。

〔2〕 从东汉帝陵已有的发掘资料来看，朱仓M722西组南侧夯土台基被推测为石殿，中组为陵园寝殿，但石殿仅有局部被发掘，形制不明，从发掘情况初步推断是长方形殿堂建筑，与西汉陵庙不同。寝殿则大致成长方形，复原后为东西长46米、南北宽31.2米。严辉、张鸿亮、卢青峰：《洛阳孟津朱仓东汉帝陵园遗址相关问题的思考》，《文物》2011年第9期。据王咸秋、张鸿亮等先生告知，东汉陵部分陵墓封土东侧均勘探出方形的夯土台基建筑基址，推断也是石殿，是否暗示着西汉以来的旧有礼制和祖先祭祀“崇方”的原则仍有传承？

〔3〕 汉魏洛阳故城西东汉墓园墓侧建筑的大型殿基F1，就用青石板、条包砌其各侧面及登道，所以“石殿”亦可能是用石材包砌或装饰，参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城队：《汉魏洛阳城西东汉墓园遗址》，《考古学报》1993年第3期。

杨宽先生曾指出，帝陵“石殿”应是从地方（南阳地区）石质祠堂发展而来¹³，二者皆正立于墓前或墓侧，充当着如陵庙一样的祭祀之地，但其形制显然已经脱离了西汉时期陵庙制度的约束，而更接近于居寝一类的设施，这正是两汉时期陵庙、陵寝制度变化的缩影。

四 结语

综合文献资料与考古发现，我们认为，西汉时期陵庙与陵寝有着不同的建筑形制：陵庙为祭祀神主之所，因受到五行思想的影响，而形成了平面方形、四向五室的建筑格局，并且每一面上铺设相应的四神瓦当、铺地砖，墙壁上也填涂青、白、黑等不同颜色；陵寝则为放置死者衣冠、几杖之地，每日上食、盥洗等，象征如生时一样奉养亲人，所以其建筑形制同于生人居室，努力营造“事死如生”的氛围。

受此影响，西汉一朝的重臣贵胄也纷纷在墓园内起立祠堂，并同样将其建成方形、四面开门的形制。普通仕宦和平民的墓祭祠坛也都按例用瓦甃砌成方形，所以《葬律简》中明确记载“（彻侯）祠舍盖，盖地方六丈”，而这样也能较好地将张安世家族墓园内发现的建筑遗址与文献所记对应。依据这一礼制传统，我们认为海昏侯墓墓园内的F1、F2建筑应分别对应着园庙与园寝设施。

东汉之后，陵庙之制被废止而在都城中实行集中庙制，但西汉以来的墓祭传统又作为“上陵礼”被固定下来，那么这些对先主的祭祀礼仪就只能在陵寝系统中来完成，所以东汉皇室又在陵园内创立“石殿”建筑，来作为专门祭祀的正殿，而将专藏衣冠的寝殿移于旁侧。从制度渊源上看，石殿与各地涌现的石质祠堂关系密切，二者皆正立于墓葬之前，既继续充当着此前祠堂墓祭的功能，又兼含着园寝的礼制意义，属于广义的陵寝系统。因为没有神主而仅虚设神坐²，石殿和石质祠堂自然不属于严格的宗庙范畴，其营建也就不再受到西汉以来宗庙建制规划的约束，而与生人居寝更为趋同。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历史系]

(责任编辑：盛 洁)

<1> 前揭《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

<2> 从文献来看，石殿内可能仅有虚设的神坐，而未见到上陵礼迁移神主的记载。当然地方祠堂虽与石殿同出一源，但祭祀制度并非如皇家一样严格，是否存在将神主放置其中的可能目前还不能确定。从孝堂山石祠、朱鲔石室、武氏祠来看，皆是满绘石刻画像，并未见到有放置神主的空地或壁龛。

On The 'Chair' Spreading into Central China in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Hang Kan

*The article Chinese appears
from page 004 to 019.*

ABSTRACT: The 'chair', born in the west and named *Yǐzi* in Chinese, was introduced from the west to the east on more than one occasion. But it was not popularized in the central plain of China until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for the Han people had been accustomed to sitting on floor mats instead of chairs. In fact, the making of a chair was not that complicated, so it is cultural custom not techniques that affected people to accept or refuse the high-seat household furniture like a 'chair' of sort. The analysis based on archaeological and textual materials is followed that 'chair' was first used by the military commanders of Hebei area in the Tang Dynasty, then spread to the central plain of China with the extending influence of the members of the political groups of Hebei area in the Five Dynasties and the early Northern Song Dynasty.

KEYWORDS: chair; the central China; spreading; military commander

On The Overall Design of The Temple and Mausoleum in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Zhang Wenjie

*The article Chinese appears
from page 020 to 031.*

ABSTRACT: The Western-Han Dynasty had the sets of ritual regulations respectively applied to the construction of temples and mausoleums. Specifically, the temple, the place of enshrining the gods, was square-shaped in plan with one structure at its heart and four wing-halls in four directions, whose design was under much influence of the Wuxing (the five elements) ideology, whereas the mausoleum, the resting place for the deceased emperors, took after the residence of the living people in shape and structure with the clothes, cane and arm-rest frame inside to honor the deceased as if he were alive. The high-rank officials and nobles of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took the same way to build ancestral halls in their graveyards. The ordinary officials and civilians followed to construct ancestral halls in the cemeteries or sacrificial altars in front of the tombs as is in detail described in the bamboo slips on the *Rites of Funerary* (Zanglv Jian). The analysis above is of much help for speculating about the architectural form and function of the ancestral hall and mausoleum in the cemetery of Seigneur Haihun.

KEYWORDS: the Han Dynasty; temple; mausoleum; ancestral hall; architectural form

On The Principles of Naming and Dating The Stone Beast Sculptures Unearthed in Sunqitun Village, Luoyang in 1954

Li Chongrong

*The article Chinese appears
from page 032 to 044.*

ABSTRACT: 'Tianlu' and 'Pixie', mythical beasts of stone sculpture, usually stood on the both sides of the course way leading to the entrance of the mausoleum of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The thesis examines the pair of stone beast sculptures excavated in Sunqitun Village, Luoyang, Henan Province